

ZHENGZHIXUE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
如何得到？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



商务印书馆

政 治 学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著

杨昌裕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 年 · 北京

Harold D. Lasswell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Published by Whittlesey House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根据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惠特尔西分公司 1936 年版本译出

60F16/24

ZHENGZHIXUE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著

杨昌裕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95-2 / D. 7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5 千

印数 0—2 800 册 印张 5 3/8

定价：2.40 元

序　　言

本书对政治的解释构成政治活动家实际工作态度的基础。政治活动家的技能之一就是对权势及权势人物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

这种对政治的看法虽然对所有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并不新鲜，但是它却处于不断被冲淡的危险之中。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本简明的英文著作，向学生、教师、学者、公民和政治活动家阐述这种观点，并联系现实情况考察这一观点。

由于对这种基本观点缺少适当的提示，因而带来了某些实际上和理论上的后果。结果是，实践中的政治活动家让自己陷入眼前事务之中，缺乏长远眼光成了预料之中的事情。而那些不为紧迫的与压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必要任务所干扰的系统研究人员常常在一些细微末节的问题上咬文嚼字斤斤计较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人们已经使用新的手段或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谋求权势时，研究权势的概念也必须有所变化或是有所创新。在迅速发展的时代里，很有必要对智力工作的恰当与否进行重新估价。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差不多每一个人对确定方向的必要性都是确信不疑的。正如卡尔·曼海姆所坚决主张的那样，一个刚刚开始致力于按计划发展的社会是需要一些新的思想风格的。

目前，在苏联以外的世界各地，批判性的不满情绪十分盛行。人们对于在已经修建完好的智力大道上旅行表现得很不情愿，其原因不是对工程质量有所抗议，而是对这条道路的始发点和到达点抱有怀疑态度。大部分关于比较政府、比较法律和比较行政学的

文献都致力于研究实际制度的分类，而很少涉及到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受到损害或得到帮助的那些现存的形式。政治分析的火光在充满政治无为主义的文献中变得黯然失色了。

英国、奥地利和美国的经济学对于这种智力气候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如果我们相信李嘉图的理论，那么古典经济学就是关于作为权势的主要手段之一的财富之分配的学问。对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财富分配的情况，已经有周密的论述。但是在古典分析中，对于在其他条件下的分配情况却说明得不够。现代发生的事件尖锐地提醒我们，除了讨价还价之外，分配主要依靠神话和暴力（依靠信仰与掠夺）。

本书除了阐述和证明这一观点之外，未作其他更多的努力。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和在别的地方所讨论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书末的各章参考文献提示中显示出来。专家们在分辨原始材料与大量的派生材料上不会感到无所适从。一切接受这里所提出的参照系统的人士将能分享指导今后智力工作的各种共同标准。

这种分析法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引出许多实际的连带问题。我的研究结果在许多方面与我的朋友、同事和代表——州参议员 T. V. 史密斯教授的《美国政治前景》一书最后几章是并行不悖的。不论我作为朋友、同事，还是作为选举人，这一点对我来说都是极其令人满意的。

从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自传的试验》中引用的一段话得到了 H. G. 威尔斯的慨然允许。重印尤金·奥尼尔的《哀悼变为厄勒克特拉》的那些话是经兰道姆公司同意的。

H. D. 拉斯韦尔

1936 年 6 月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篇 精英

第一章 精英 1

第二篇 方法

第二章 象征 19

第三章 暴力 33

第四章 物资 47

第五章 实际措施 62

第三篇 结果

第六章 技能 77

第七章 阶级 91

第八章 人格 106

第九章 态度 121

第四篇 概论

第十章 概论 137

参考文献提示 147

第一篇 精英



第一章 精英

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

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elite)；其余的人是群众。

在正规的等级制社会中，尊重的分配是比较清楚的。罗马天主教金字塔式等级制度的最高峰由少数官员占据。这些人包括1个教皇，55个红衣主教，22个使徒代表，256个名誉主教，245个大主教和1,578个主教。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是由9人或10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而美国较为松散的政府结构，则赋予由9人组成的最高法院、由1人担任的总统和由几百个人组成的议会以特殊的权势。在美国，虽然每个聪明能干、能说会道的青年男子都知道，有一天他也有可能当上总统，但是在上一代人中只有8个男青年达到了这个目标。强有力的美国参议院虽然机构相当庞大，但在每一代人中也只能为480个参议员提供席位（假如没有任何人连选连任的话）。尊重这座金字塔，无论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是难于攀登的。

和尊重的分配相比，安全的分配往往不是那样不平均，并且有时显示出一种相反的关系。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内，有423位君主死于暴力。玻利维亚历任总统中，40%的人在暴力中丧生。这些数字和1921年中美国暴力死亡（包括自

杀)人数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7.2% 形成粗略的对比。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中有 12.1%，天主教教皇有 9% 死于暴力。就整个人口来说，相对安全的情况，则依时代而各不相同。在十七世纪死亡的法国人中，每一千人中有 5 人是在战斗中死亡或受伤的，这个数字，在十八世纪中上升为 12，在十九世纪上升为 13，二十世纪则为 14。

在属于西欧文明的各国中，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很不平均。在商业兴隆和投机活动盛行的 1928 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为 541 美元，是法国或德国人均收入的两倍半(美元价值按 1913 年的购买力计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1913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 368 美元。后来一段时期中，美国在各主要国家中显示了最大的绝对增长，但最猛烈的相对增长则要数日本；日本的人均收入从 1913 年的 22 美元上升到 1925 年的 53 美元。从绝对数字看，英国仅次于美国，1911 年为 250 美元，1928 年上升为 293 美元。俄国从 1914 年的 52 美元上升到 1928 年的 96 美元，这个数字比法国或德国的相对增长还要大些。意大利则从 1914 年的 108 美元下降为 1928 年的 96 美元。

国民收入的分配，在某些社会内部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差别。在 1918 年至 1926 年间，美国人口中的 10% 占有了全部国民收入资金的 $\frac{1}{3}$ 。

上面举出的尊重、安全和收入等几种价值标准都只是代表性的，而不是唯一的、非此不可的价值标准。也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组合来进行政治分析，这样，对精英所做的各种比较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如果选择权势人物的不同特点作为重点来进行政治分析，其结果也会出现差异。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按技能(skill)来进行价值分类。

显然，战斗技能是人们赖以上升的直接途径之一，无论战斗是

以上帝、国家的名义，还是以阶级的名义来进行，都是一样。穆斯塔法·凯末尔^①曾在1911年意土战争中作过战，1915年他曾在加利波利及其他地方指挥过北部的土耳其部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战火的洗礼。苏联的几个当权人物都是通过非法暴力而不是合法暴力的途径逐步上升的。约瑟夫·斯大林曾在1901年被当局逮捕过，以后转入地下，在革命运动中工作，也经常处于冒险之中。波兰过去的独裁者毕苏斯基^②，1888年因与波兰民族运动有牵连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92年参加了社会党，并组织起秘密军队。

赫尔曼·戈林是“里希霍芬伯爵”空军中队的最后一个指挥官。这个中队在大战后期曾写下过辉煌的历史篇章。国家社会党委书记鲁道夫·赫斯是希特勒的亲密伙伴，他曾担任过德国“35”侦察飞行队队员。国社党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赖伊博士和直到纳粹夺取政权之前一直和希特勒保持密切关系的史特拉塞一样，也曾当过空军飞行员。还有许多海军军官，特别是潜艇军官都曾在党派政治中发挥过同样积极的作用。

在与暴力有密切关系的民政职务方面，可以举出罗斯福家族与海军部助理部长职务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作为例子。最初是西奥多·罗斯福，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从1913至1920年曾担任这一职务，后者还在1918年7至9月间负责过对驻扎欧洲海域的美国海军部队的检查工作。

美国内阁中政治组织工作的技能向来以邮政部长为代表。在

① 凯末尔(Kemal, 1881—1938)，另译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杰出军人、政治改革家、第一任总统(1923—1938)。——编注

② 毕苏斯基(Pilsudski, Joseph, 1867—1935)，波兰革命者、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11月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1918—1922)。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编注

共产党书记斯大林铲除托洛茨基时，组织技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希特勒擅长演说和组织，是二者的卓越结合，墨索里尼兼有演说、新闻工作和组织工作三方面的特长，马萨里克^①则同时具有演说、新闻、学者和组织各方面的特长。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政治委员会采取以更多的组织技能代替演讲、新闻与学术技能的办法已经逐渐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

依靠某些重要的象征来处理关于人的问题也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包括使用像演说、辩论文章、新闻故事、法律辩护、神学论争、带有一定目的的小说以及哲学体系等各种传播媒介在内。在物质环境由于技术的扩展而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人们靠熟练地使用象征来谋生的机会正在迅猛增加。例如，自 1870 年以来，美国职业著作家的人数已从原来微不足道的数字跃升至 12,000 至 13,000 人之多。艺术家的人数过去是 4,000，现在已有 60,000 了。演员由过去的 2,000 发展到现在的 40,000，音乐家的人数已经不是 16,000，而是 165,000。教师业的人数增加了 10 倍。1870 年时只有 1 个新闻记者的地方现在有了 10 个。今天共有 300,000 名律师。律师在法庭、立法机关、各种调查团、董事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总统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人是律师出身。

和处理人的问题的情况一样，现代处理物的问题的专家人数，也有了惊人的增长。在美国，技术工程人员（不包括电工在内）从 1870 年的 7,000 增长到 1930 年的 226,000 以上（整个说来，挣工资雇员的增长率仅为 300%）。但是，和运用象征影响群众的专家相比，工程专家所受到的尊重却要少一些。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现代工业飞速扩展的情况下，讨价还

^① 马萨里克(Masaryk, Tomáš, 1850—1937)，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编注

价的技能顿时成为通向飞黄腾达的捷径。

除技能外，精英还可以从阶级方面来进行比较。阶级是具有类似职能、地位和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当今世界政治上，主要的阶级结构分为贵族阶级、富豪阶级、中产阶级和体力劳动者。

1925年德国地主贵族阶级拥有占全国可耕土地20.2%的大地产中的绝大部分。易北河以东土地的40%都属于他们。总的说来，这些大地产在德国全部土地占有户数中仅占0.4%。处在这座金字塔底部的是大批只占有小片土地的人：占德国全部土地占有户数59.4%的人仅占有可耕土地的6.2%。

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贵族阶级手中的情况，在智利特别明显，官方统计表明，在57,000,000亩私有土地中约有50,000,000亩掌握在2,500个个人手中。在战前的匈牙利，1,300亩以上的产业只占全国土地占有户数的千分之一，其土地面积却占总面积的17.5%。在以前沙俄帝国波罗的海各省，贵族阶级占有大片土地的情况更为突出，以致像爱沙尼亚这样的新国家在其成立之初就发现，仅1,149个大地产就占据了土地总面积的58%。有一半土地属于封建贵族房地产的拉脱维亚，在1922年土地改革中，就设立了43,000个新的农民土地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商业、工业和金融各方面逐渐兴起了一批庞大的富豪集团。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约翰·雅可布·阿斯特财阀，这个家族从与东方国家做买卖、搞皮毛生意以及在纽约进行不动产投机等活动中积累了20,000,000美元的财富。工业财阀的兴起稍晚一些。范德比尔特从铁路投机中获得了100,000,000美元的巨资。麦考密克靠农业机械起家，卡内基靠钢铁，洛克菲勒靠石油，摩根则靠银行投资活动起家。到1929年左右，在美国收入超过百万的富翁共有504人，他们的财富总计达35,000,000,000美元。这些庞大产业一般说都是五花八

门、无所不包，它们在名义上控制着正在遥远地区进行着的各种计划与活动。

十八世纪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法国贵族阶级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个新兴资产阶级却很快地与日渐衰落的贵族阶级熔为一体。在 1913 年，德国最大的富翁虽然是新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拥有 70,000,000 美元的克虏伯财阀，但仅次于他的第二大富豪却是贵族东纳斯马克王子。德国皇帝居第五位。这些贵族财产大部分也都变得五花八门，依附在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上面。

贵族阶级为新的社会结构所逐步取代的情况在一项对十九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内阁大臣的分析中显示出来。哈罗德·J·拉斯基指出，在 1801——1831 年间，71 个英国内阁大臣级官员中至少有 52 人是贵族阶级的儿子。1906——1916 年间，贵族儿子在 51 位大臣中只占 25 人，他们的人数降低到了与其他社会阶级均等的水平。从 1917 年到 1924 年，53 位内阁大臣中只有 14 人是贵族出身的。

在日本，这种向现代工业化与现代金融的过渡是通过把新企业分配给一些大封建家族来实现的。

下层中产阶级是由一些靠技术换取微薄金钱报酬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个阶级包括小农民、小生意人、低工资的专业人员、熟练工人与工匠。体力劳动者则是指那些没有专门技能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关于如何划分富豪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政治实践中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科学家们的意見也很不一致。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们有时企图把熟练工人，甚至把低收入的专业人员都包括到无产阶级里去。而富豪阶级的宣传家们则把“企业”说成一个整体，企图把大企业、大财主与小企业、小财主之间的区别加以抹煞。

阿瑟·N.霍尔库姆把布哈林对这些词所下的定义应用于美国,得出如下的结果:把24,800,000个雇佣劳动者和14,000,000个家庭主妇归入“无产阶级”项内,所得出的“无产阶级”的数字中有51.7%是雇佣劳动者,1.6%是资本家,8%是地主,剩下的则是些“两者之间”、“过渡性的”、“混合的”和“未分类的”。据W.I.金估计,1924—1927年间美国雇佣劳动者平均收入约为1,885美元。实际上“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尽管数目不详——的人所得的收入超过这个平均数。

在那些为了获得技能而作出过牺牲的人们心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看法,这种心理上的联系倾向于把小资产阶级从没有技能的无产阶级一边拉向富豪阶级一边。另一方面,地位低微的专业人员、商人、农民和熟练工人由于对一种没有保证把高报酬分配给技能的社会制度普遍感到不满而趋向于远离那些保全富豪阶级的社会结构。霍尔库姆划入“无产阶级”的人们中既有半熟练与不熟练工人也有熟练工人。因此,按照这种理解,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属于小资产阶级。资料证明,在美国生活中,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一直在排挤和取代着体力工人。据估计,机器革命已经把美国工人人口中约计25%的人从艰苦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节省劳力的机械也减轻了那些留在农村、矿山和工厂中的人们的负担。1870年时,有52.8%的雇佣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到1930年,这个数字下降为21.3%。这些变化大部分发生在商业、运输业(从9.1%上升至20.7%)、办公室工作(从1.7%上升至8.2%),和专业服务机构(从2.7%上升至6.5%)等方面。

除了技能和阶级以外,还可以按人格来考虑价值的分配。临床心理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所熟悉的各种人格形象都取得什么样的相对成就呢?受虐狂者、施虐狂者、与世隔绝者、癔病患者、着迷者、受迫害者,这样一些心理变态的人各自都有什么样的命运呢?从这

一个观点来考察，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是围绕着阶级与技能打转，而变成一连串的人格形象了。

这里，引起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因受先天及早期教养的影响而倾向于以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特殊角色以求得满足的人格形象。鼓动家就属于这一类型。他那种渴望从同龄人方面受到迅速而热烈的崇敬的强烈欲望使他从他的同伴中分离出来。这种人感情上倾向于用演讲术和报刊辩论文章这些取悦群众的技能来培育和武装自己。而那些不太惊人的组织家则是对激动的反应需求较小的人。鼓动家在危机的紧急关头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而组织家则在危机的间歇期受人欢迎。在危机加剧时，阿斯奎斯^①让位给劳合·乔治^②；兴登堡^③让位给希特勒。危机的缓和则为鲍德温^④或哈定^⑤登上舞台准备了条件。

在危机的早期阶段，那些兼有坚定与仁慈、体谅多于残忍的人格会一马当先加速前进。因为出现在战争或革命前夕的压城乌云会在群众中引起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在灾难即将到来之时，渴求保证与放心的需要使温文尔雅的林肯比性烈如火的西沃德^⑥更受欢迎。

① 阿斯奎斯(Asquith, H. H., 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1916年因战事失利和国内发生都柏林起义，被迫辞职。——编注

②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擅长演说。他的社会政策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先驱。——编注

③ 兴登堡(Hindenburg, Paul von, 1847—193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编注

④ 鲍德温(Baldwin, Stanley, 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至1937年间3次任首相。——编注

⑤ 哈定(Harding, Warren, 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编注

⑥ 西沃德(Seward, William, 1801—1872)，美国南北战争前辉格党和共和党内反对奴隶制的政治活动家。1861—1869年任国务卿。——编注

存在着一些对专横暴力很容易发生迷恋的人格形象。他们学会了用极度强烈的专横任性来威吓周围的一切。他们以向外转移自己对困难处境的愤怒作为方法，在统治中得到了成功。这些就是拿破仑式的人物，这种人很容易毁掉自己或别人。

不管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对尊敬所具有的强烈的要求。当这样一种动机与纵横捭阖的技能相结合，又遇到适宜的环境时，一个活生生的政治家就会应运而生。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在充满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实现他的命运的。他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

真正的政治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成品。当婴儿刚刚出生时，他们对附近的或遥远的环境还不具备相关的概念。他们的感情冲动最初只是针对周围亲密的小圈子组织起来的。在这个初始阶段，与客观世界相关的各种象征开始具有了意义。而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则学会了把公共事物组成的世界用作减轻他周围环境中各种压力的一种手段。对尊重的强烈欲望在亲密的小圈子中一旦遭到挫折或过分纵容时，就转向更大的环境去寻求表现。于是在各种似是而非的符号的名义之下，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被合法化了。他给人们的暗示是他的行动并不是以行动本身为目的，是为了上帝的光荣，为了家庭的神圣，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阶级的解放而在那里努力奋斗。在极端情况下，这种政治活动家不受周围环境中任何具体事物的约束。他对那些在科学、艺术和技术中可以辨认的自然界的常规毫不在意，他所关心的只是客观事物对他的自我在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除了上述各种技能、阶级及人格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态度群来考察价值分配的情况。那些把对国家、对民族、对阶级、对行业、对个人共同抱有的忠诚信念作为权势基础的权势人物把世界